

凯、张之洞、刘铭传、盛宣怀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及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



曾国藩

奕訢

刘铭传、盛宣怀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及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本书以叙述关键人物



李鸿章

袁世凯

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本书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



慈禧

载沣

本书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庶几可为以通史体裁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补充读物，以增进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之了解。本书中的“



张之洞

光绪

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庶几可为以通史体裁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补充读物，以增进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之了解。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刘铭传、盛宣怀



翁同龢

溥昌

了解。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刘铭传、盛宣怀等人，在

中国近代史上的

关键人物

苏同炳、著

(第三版)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上的
关键人物

苏同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 苏同炳著. -- 3 版.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06-6274-8

I. ①中… II. ①苏…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中国-近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3190 号

责任编辑:高 为 装帧设计:刁子勇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556 千字 图数:26 幅 插页:2

印张:21.5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2013 年 4 月第 3 版

印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自序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全书约六十万字，是我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写成的一本通俗性历史读物，目的是在希望通过为晚清历史上若干关键人物撰写传记的方式，更鲜活明白地解说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情形。此书先在台湾的《青年日报·新文艺》副刊逐日登载，连载完毕后即由台北的四季文化出版公司印行单行本。一九八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将它在内地发行影印本。时隔十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打算以简体字重新排印，以便能以全新的面貌与内地读者见面。此一盛意，对我自是莫大的鼓舞与激励。感谢之余，谨在此略述缘起，以当序言。

历史是人事活动的积累，手握国家军政大权的领导人物，他们的思想言行，更直接与国家命运的休戚息息相关。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晚清中国，正当西方势力剧烈冲击，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咸丰、同治之间，内则有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回之乱，外则有英法联军之入侵，当时不但东南半壁糜烂不堪，即是广大的华北平原及西北、西南腹地，亦复萑苻遍地，民不聊生。此时幸有恭亲王奕訢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主持于内，曾、胡、左、李等一班督抚将帅效命于外，同心匡济，竭力撑拄，卒能内靖大难，外拒强敌，弼成同治、光绪之间的小康局面。这些重要人物的文治武功，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于至危垂绝之时，他们的功勋，必

将在历史上永著声光。但不幸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物接连发生重大变故，咸丰不寿，同治夭亡，慈安暴崩，光绪懦弱，这一切的一切，最后只造成了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而独揽国家政柄数十年之久的机会。由于慈禧之好把持权力及报复恩怨，遂致光绪中叶以后的政局出现空前的颠倒错谬，此后并因其迷信义和团的神力可以扶清灭洋而招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几乎因此而亡国。看了这种兴衰变化与贤不肖人物之进退情形，怎不令我们瞿然领悟人事因素对历史影响之大。所以，要知道晚清中国的历史何以如此灾晦否塞，国事蜩螗，透过当时国家领导人物的言行思想去探索其中内情，应该也是可行的方法。由于此一构想，我就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庶几可为以通史体裁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补充读物，以增进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之了解。一九七六年夏天，《青年日报·新文艺》副刊的主编胡秀先生约我写稿，我向他提出此一计划，得其同意，于是我就以两年半的时间，陆续写成曾国藩等廿二人的传记，合共十四篇，集结在一起的总书名，就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回首前尘，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瞿鸿禛、盛宣怀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坊间所刊行的中国近代史，佳作如林。但这些通史体裁的史著因其体裁所限，其叙述总是全面性的，对于当时主政人物的言行思想与他们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往往因写作体例之限制而无法着墨，因此也使人难以窥见历史演变之契机与其中曲折。学术著作总是不容易引起读者之阅读兴趣的。本书之作，旨在以说故事、谈掌故的方式来补充学术性史著之缺略，从而引起读者深入了解历史演变之兴趣。至于我的此一努力是否能达到目标，当然得看

我的写作能力与取材范围是否适当了。自愧才疏学浅，深恐难以满足读者之期许。不逮之处，尚祈广大的读者不吝指正，是为至盼。

苏同炳 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于台湾南港

目 录

自序	001
曾国藩	001
胡林翼	029
左宗棠	059
张之洞	096
刘铭传	138
咸丰、慈禧与恭王	166
李鸿章	230
翁同龢	285
同治与光绪	337
大、小醇王	389
端王、刚毅与荣禄	446
袁世凯与庆亲王	499
瞿鸿禛与岑春煊	590
盛宣怀	634
参考书目	680



曾国藩(1811—1872)是一位崇尚经世致用的学者,他编练湘军,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要功臣,经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清皇朝,在同治、光绪年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景象。

曾 国 藩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假如没有曾国藩出来力任艰巨,则太平天国之乱事必难平定,清皇朝的命运,也不必等到辛亥革命,就会提早五十年结束。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所以经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清皇朝,才会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这一个在中国近百年史上居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自清末以至民国,自中国以至外国,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几乎无不深致敬仰景佩之诚。唯一的例外,只是清末革命运动蜂起之时,革

命党人对他所加的苛刻评论。

勃兴于清末的革命运动，首先揭橥其排满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基于此一革命主张，为满族所建立的清皇朝当然是必须推翻的革命对象。至于那些在清皇朝中做官的汉人，如果他们曾经出力镇压过汉人的革命运动，亦必被视为替异族效劳的功狗，诋之为汉奸，斥之为民贼。曾国藩生当清代末年，适逢太平天国的反清革命之会，而他又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出力最多的人，于是也就不免被晋为帮助清政府镇压汉人革命的刽子手，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同被画成人首兽身的畜类，口诛笔伐，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实在说来，自明朝亡国，经过清皇朝一百多年来的高压统治与怀柔收买，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思想，大都已经泯灭无存。曾国藩生当此一时代，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局限在一定的范畴之内——除了忠君爱国之外，就只知道如何砥砺品德，进修学问，以及一旦得官入仕，如何为社会民生谋求福祉。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在他的家书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得出来。《曾国藩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书》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这正是中国的标准儒家思想——只有以社会民生为重的天下思想，而没有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责备曾国藩何以在太平天国革命时不知赞助革命，以便乘机恢复汉人的政权，反而要为清皇朝出力镇压此一民族革命运动，就未免昧于时代环境，对曾国藩持论过苛了。所以自革命成功以后，自政府首要以至政论家、历史学家，都已另外以新的观点对曾国藩重作新的评价。以新的观点来看曾国藩的一生事业，便会觉得，曾国藩不但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在今日，他的思想、言行与功业，也依然是

我们所不能企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成其伟大，只有在这些地方可以明白地看得出来。

曾国藩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终生笃实履践。他的朋辈与僚属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进德修业及负责尽职自期，所以才能团结众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难，转移风气。除此之外，则他的命运在他的一生事业中也曾有过重大的关系。清人朱克敬所撰的《瞑庵杂识》中有一条说：

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摭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这所谓“不信书，信运气”之说，并非空言泛论，而确实系有感而发之言。试综观曾国藩之一生，如果不是命运之神有意要成全他的话，即使他终生砥砺品德，笃实履践，始终不懈，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矜矜自守的君子，绝不能在国家民族面临极大危难的重要关头让他出来领袖群伦，创下如此惊天动地的不朽大业。凡此种种，在他的一生传记之中，都有明显的事迹可以稽考，不能斥之为无稽调言。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人。他家世代业农，到他父亲麟书时，方才因读书而成为县学中的一名“生员”——秀才。曾国藩在六岁时开始从师入学，十四岁开始到长沙省城应童子试，先后考过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亦即曾国藩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翌年，领乡荐，中式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八年，亦即曾国藩二十八岁的那一年，会试亦捷，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照一般情形来说，读书人能够在一连串的科举考试中先后得捷，已经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资格，从此功名得遂，衣食无忧，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踌躇满志的了。但若就事实而言，则又不尽然。因为在进士之上，还有更高一层，即俗语所说的“点翰林”。中了进士，不一定能做大官；点了翰林，那才真正具备了做大官的资格——不但是资格好，而且升迁也快。但点翰林必须进士的名次考得高。一甲进士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榜发之后即授职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立刻成为名实相符的“翰林”。至于二、三甲的进士要想成为翰林，还得经过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

林院教习三年，期满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正式成为翰林院中的一员，其或改官部属，或授职知县，从此与翰林绝缘。而进士参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为多，三甲者寥寥无几。所以，曾国藩如果不是运气好，他在中了三甲进士之后就很难被点为庶吉士。点不了庶吉士，当然更成不了翰林，这对于他以后的官职升迁，影响就大了。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之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呈皇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就这样，曾国藩才幸运地被点中了庶吉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考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因此他被授职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曾国藩能够先中进士再成翰林，对于他的一生事业前途，关系甚大。《曾国藩家书》卷二，载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致弟书》，云：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岂不颡颥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所谓“入泮”，即是中秀才之意。而由秀才至翰林，路还远得很。由他所说“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及“此中误人终身多矣”的话，可以知道曾国藩假如不是早中进士入翰林，此时必然仍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之中奋斗挣扎，绝无如许闲暇可以容他读有用之书，储备学问，以为他日救时匡难之用。这是他自己所说“不信书，信运气”的第一步征验。至于第二步的征验，则是他在做了翰林院检讨之后的历次考试情形。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谓不定时举行的“大考”，到时由皇帝命题考试诗文策论，以为升迁降黜的依据。大考成绩好的，升迁特别快，否则立予降黜，绝不容情。故而清代俗语，有所谓“秀才怕岁考，翰林怕大考”的话，正是针对那些侥幸得售而不肯努力上进的读书人而说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由于他向来用功不懈，历次考试的成绩都很好，因此

屡蒙超擢,不过七年的工夫,就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直升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具备了他此后出当大任的官阶与资格。若非命运的安排,他怎能有如此良好的机遇呢?清人王定安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叙此,云: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二等第十九名,授检讨,旋派顺天乡试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国史馆协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六月,诏以公为四川正考官,赵楫副之。七月,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回京,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转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记名,遇缺题奏。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翰林院的侍讲与侍读,秩从五品;詹事府左右庶子,秩正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秩从四品;至于内阁学士,则从二品。清代官制,满汉并用。翰林院官的升迁途径有二,一是考试,二是考绩,而考试成绩优良者,较考绩的升迁尤快。至于翰詹以外的京官与外官,则升迁之途只有三年一次的考绩。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参加考绩,须先占得空缺。而进士出身以部属官及知县用者,往往数年不能补得一官。既不能补官,自更不能由考绩升官。所以,即使同是一科考中的进士,由于翰林与非翰林及大考成绩优劣不同的关系,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苑枯各异,云泥有别。如曾国藩在中进士之后的第二年,还不过只是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年之后就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二年后又升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又过二年,就再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了。像这样每隔二三年就超升一二阶的情形,在翰林中虽是常有的事,若是翰林院以外的一般京官,就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京官以外的外省官员,升迁较京官更难,自更不能有这么好的运道了。他不必论,即以同为翰林出身的胡林翼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样。

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的二甲进士,科第要比曾国藩早二年,名次也比曾国藩高。朝考入选之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十九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在这一段经历上,他的资格与成绩和曾国藩一

样。只是他在道光二十年的江南乡试副主考任内出了毛病，被降一级外调，从此蹭蹬仕途，直到咸丰三年，曾国藩已经做到了正二品的侍郎，胡林翼还在贵州黎平府做从四品的知府。后来虽然由于胡林翼自己的干练，声誉日起，也还需要曾国藩的全力推荐，才能使他有机会到湖北战场上去大展身手，由按察使、布政使，而一直升到巡抚，官位与曾国藩相等。在这一段经历上，胡林翼的升迁，足足比曾国藩迟了七年。而论到出身，胡林翼还是曾国藩的翰林前辈呢！曾国藩的宦途得意，对于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及清皇朝的存亡，关系甚大。假如曾国藩在咸丰初年还只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纵使他有通天的本领，他也没有出头的机会。又假如曾国藩与胡林翼一样，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位不高的中级官员，那也轮不到由他出来领导群伦，成就他此后的回天事业。所以说，曾国藩能够在太平天国崛起之后，以一个在籍的侍郎出来组织湘军，夷平大难，其中实在杂有很多机缘凑合的因素。曾国藩平生，不信书而信运气，在这里就有了很明显的征验。至于他之能够在翰林院中读书进修，当然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了。明、清时代的翰林院，乃是新科进士“读书养望”的好地方。能够进得了翰林院的进士，既不必为实际政务所劳扰，又可以从容阅读翰林院中的丰富典籍，尽量在经史、文学、政经、军事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问。《曾国藩家书》卷二，收有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致弟书》，云：

兄少年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穹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所谓“范、韩”，即宋朝有名的贤相范仲淹与韩琦；所谓“马迁、韩愈”，则是有名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与古文名家韩愈。由此可知，曾国藩在未进翰林院之前，不但对学问之道未得门径，而且卑无大志，只是一个碌碌庸庸的陋儒而已。而在他中进士做翰林之后，日与良朋益友相往还，于是方得窥学问之门径，而有志于圣贤之学。黎庶昌撰《曾文正公年谱》，亦说：

公少时器宇卓犖，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纪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花草。

由此可知，曾国藩一生仗以成功的志行与学问，都是在此时奠定其基础的。所以然之故，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得有良好的读书环境，二方面亦因得有良朋益友的切磋。他在此一时期内所交的朋友，计有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圻、邵懿辰、陈源兗等，逐日相与讨论问难，得益极多。至于他在治学方法上的导师，则是时任太常寺卿的唐鉴。由于唐鉴邃于义理之学，亦即《宋史》所谓之道学，曾国藩常向请益，遂以朱子之《近思录》及濂洛关闽诸子之书为日课，肆力于宋儒之学。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尤大。曾国藩后来从事于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经常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若不是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周旋到底，恐怕也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中的陶镕范铸。至于他在做翰林时期内因致力于经世实用之学而对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实用方面的学问都大有所得，而在此后的对太平天国之战中发挥其实用，更是有目共睹之事，不必多所赘述。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有无名子赋《一翦梅》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鏞，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鏞之琐

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所以他实际上乃是道光皇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之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太平天国之乱，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民生凋敝，灾变相乘，而贪污官吏之侵渔迫害，亦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等到太平天国军在广西起事之后，清政府调兵遣将，竭力企图将之迅速扑灭。不料兵不能战，官不能守，前方传来的军报，但见溃败相继，多年训练的几十万大军，竟然抵敌不了一些初起的草茅之寇！道光皇帝这时恰好在危疑震撼的动乱时代中崩了驾，咸丰皇帝继位，派大学士赛尚阿到广西去督师，也仍然阻遏不了太平军的燎原之势。曾国藩这时已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谓：“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接着他提出激励振作之法：“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在这一道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人才之何以消沉汨没，有其透彻的认识，而对于人才之培养作育，更有其独到之看法。

其余各疏，如《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对于当前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等切要的问题，也都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前的时弊，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因为此疏的重要性如此之大，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重视。

曾国藩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所指出的皇帝“圣德”，一是敬慎。谓皇帝每当祭祀之时，“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琐碎之弊，在见小而遗大，谨其所不必谨，而于国计之远者大者，

反略而不问。“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赜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弘济于艰难者。”这对于当时自皇帝以至宰相百僚之避重就轻，涂饰细行，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不啻是无情的棒喝，可谓痛切之至。至于皇帝的第二样“圣德”，则是好古。谓皇帝于“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文饰之弊，在尚虚文而不务实际。“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诗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诗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真学真识乎？”道光、咸丰以来的所谓“人才”如此，如之何不使政风败坏，盗贼纵横呢？至于曾国藩疏中的第三项“圣德”，则是“广大”。谓皇帝“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广大之弊，在自以为公正开明而不自知已蹈拒谏饰非之误。以致“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予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绝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曾国藩之风骨劲棱，在这里也就充分可以看出他之不同凡响。

曾国藩在他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

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但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不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
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
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
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
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是清楚明白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其伟大不朽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此，谓：

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藻曰：敢言
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太平天国乱事之平，在这里已经伏下了契机。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

清咸丰二年三月，赛尚阿在广西讨剿太平军失利，大股太平军由永安扑攻桂林，旋陷全州，由此入湖南省境，大掠民船，将浮湘江而北出长江。其时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得家中讣闻，知生母江太夫人已于六月十二日病逝，立即改服奔丧，由黄梅县渡江至九江，雇船至湖南。尚未到达长沙，得知太平军已至长沙城外，遂由岳州取道湘阴抵家。其年十月，太平军以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去，陷岳州，陷汉阳，从此日见其燎原莫救。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湖南巡抚张亮基奉到皇帝的上谕，云：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由于皇帝的这一道上谕，曾国藩就以丁忧在籍的侍郎身份在湖南